经上海市长宁区工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宁工业投资 公司)及上海市海燕照相机零件厂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燕照相机零 件厂)的股东决定,长宁工业投资 公司吸收合并海燕照相机零件厂。 吸收合并后,长宁工业投资公司存 续,注册资本不变,海燕照相机零 件厂注销,海燕照相机零件厂注销 后其债权、债务、人员、资产均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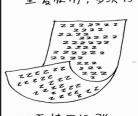
特此公告。

长宁工业投资公司承继。

上海市长宁区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海燕照相机零件厂有限公司

环保公益广告

重复使用,多次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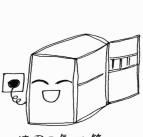
二减少量的废纸产生

优先购买绿色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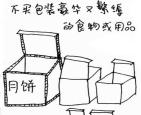




6000~8000双一次性筷子 2一株20岁的大树



使用无氟冰箱 不会造成臭氧损耗



废电池放入专门回收箱 以免污染环境



分类回收 循环再生

社会信用治理技术如何实现法治化运用

肖伟志

党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系统部署 十四个方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有 两项"重要保障"的论断,即:"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保障。""法治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保障。""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和监管制度"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出现在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标题之下。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一项"市场经 济基础制度"建设的内容,是"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2 年 3 月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 局的意见》,在强调"积极探索创新, 运用信用理念和方式解决制约经济社会 运行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的同 时,强调"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 纳入法治轨道"。根据"必须把全面依 法治国摆在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 保障性位置"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 理念, 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 规范化水平, 成为党和国家应对各种合 法性质疑的基本策略。

国家和政府主导需要立法 授权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问题,既 涉及"社会信用体系"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做,也涉及对"法律"性质和

对诚信缺失、信用匮乏的担忧近年 来愈发受到社会重视,以"征信体系" 和"失信惩戒体系"为双核心的社会信 用体系,逐渐演变成"覆盖全社会的征 信体系建设"。国家意志、公共权力机 关在其中扮演主导的角色。原来由法律 系统集中实现的全民守法目标, 开始分 散到通过非正式规范发挥作用的"声誉 机制"中去;原来由非正式约束推动的 公民道德建设, 开始通过正式规范体系 进行提升和补强: 原本通讨政府规制体 系追求市场合规,开始通过信用监管方 式予以强化及优化。拉里•卡塔•贝克尔 认为, 社会信用有两层含义, 它既可指 代一套特定的以全面实现法律和管制目 的的社会机制,也可指代一种融合法律 和统治、公共和私人领域各种治理方式 的新型治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 式,必须运用大数据管理技术,这必将 重塑法律、政府和治理的关系。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法治化就是"社会信用治理 术"应用过程的法治化。

社会信用治理是叠加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力的信用风险管理 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应用。我国的 社会信用治理,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 抓手, 由政府主导, 基于公共管理活动





□ 我国的社会信用治理,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由政府主导。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化,主要体现在为各种治理技术的应用与措施的采取提 供法律依据、法理支撑,以划定公权力的边界,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

- □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门立法,并非意在规制所有的信用评价活动,而是规 制那些可能对被评价主体(信用主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 生重要且持续性影响的信用评价活动,具体表现在信用信息管理、信用评 价及其结果应用、信用联合奖惩三个方面。
- □ 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门立法的一项基本目的,也应体 现为基本原则,相关规定应贯穿立法之始终,遵循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体系 化构建的思路。

领域的信用信息汇聚和信用风险评估,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实施分级分类治理, 具有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征。由于信用 信息技术与信用风险评估技术的应用, 治理层级压缩,治理权威分散,治理资 源和系统要素以全新的方式被组织起 来。公共权力机关,不仅是信用信息的 "传送带",还是应用信用信息推进失信 惩戒和扩张信用规模的"发动机"。社 会信用治理技术的应用,必然在信用信 息处理、信用评价与分级分类、信用监 管机制构建与实施、信用激励与约束措 施的采取、信用服务市场培育与规制等 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法治化要求。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化, 主要体现在 为各种治理技术应用与治理措施的采取 提供法律依据、法理支撑,以划定公权 力的边界,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

社会信用治理技术应用中 的公权力边界

以信用评价为中心的社会信用治理 技术应用,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工程, 需要专门立法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用评 价活动的规范化与合法化。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专门立法,并非意在规制所有的 信用评价活动,而是规制那些可能对被 评价主体(信用主体)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生活产生重要且持续性影响 的信用评价活动,具体表现在信用信息 管理、信用评价及其结果应用、信用联 合奖惩三个方面。

1 明确信用信息管理中的政府权力

信用评价活动是依据信用信息进行 的分析和评估活动。目前,政府管理信 用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的建设实现信用信息的归集、传播 和利用。由于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本身即 具有公共的性质,加之互联网时代信息 技术日新月异, 其公共性有不断被放大 的趋势,被纳入平台的信用信息,也必 然对信用主体的生活造成重要且持续的 影响。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立法必 须为信用信息平台的构建与利用提供明 确的立法保障,明确公共信用信息的范 围和类型以及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的 法律性质, 为信用信息归集、传播和利 用等一系列程序环节提供规范依据。

2.明确政府信用评价及其结果应用 活动的权力与职责

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体制创新,是

我国政府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重要方 面。这种变革,在强化政府权威、有效 实现政府管理目标的同时, 也会对公 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包括 激励性及限制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 具有正当性, 也是我国社会信用建设立 法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作为评价主体 的信用评价活动也应该做到有法可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此, 在授权与 限权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我国社会 信用建设立法在规范政府作为主体的信 用监管行为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制 度设计上, 既要坚持传统的宪法与行政 法原则, 又要给信用监管创新留出适当 的空间,给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立法以用 武之地。

3.明确政府主导信用联合奖惩的权 力与职责

信用奖惩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在国 际上存在两套不同的做法, 体现不同的 理念和方法, 也意味着立法保障的不同 需求。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自然形成的 征信机制, 在对失信记录进行处理时的 做法是"基于事实,仅基于事实"。失 信记录是否以及如何被使用, 由记录使 用者自行决定。第二种做法是由有关政 府部门或者声誉卓著的征信机构主导失 信记录及其发布, 失信信息被记录以及 失信企业或个人被纳入黑名单之前, "经过一系列的信息处理和信用评分过 程,它力图'科学'地解释失信者被登 录到黑名单的理由。具有监管功能的政 府部门和其他查询者只需知道被列在黑 名单上的企业或个人有足够严重的失信 行为,应该对它们采取联防和处罚措 施。"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加 大了政府或征信机构对联合征信数据库 的经营成本,也"可能招来被处罚的失 信者的报复"。或者如有学者所说, "国家集中甚至垄断规范评价的意图, 常有可能引发对抗式回应"。因此,需 要一套更加健全、符合更高正当性要求 的法律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体系化 构建需要立法支撑

信用主体的权益保护, 是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专门立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 题。因为信息主体与信用主体事实上的 身份重叠,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内容,既 应在信息归集、披露、共享、公开规则 中予以体现, 也应在信用评价及其结果 应用、信用奖惩机制中予以体现; 既需 要解决信用主体面对公权力时的权益保 护问题, 也需要厘定信用主体与信用服 务机构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利 边界; 既包括实体性权益的保护, 也包 括程序性和救济性权益的特别保障。因 此,虽然有地方条例专章规定了信用主 体的权益保护,但是从立法技术的角度 来看,这种做法要么涵盖不足,要么难 免重复。笔者认为,信用主体权益保护 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门立法的一项基 本目的,也应体现为基本原则,相关规 定应贯穿立法之始终,遵循信用主体权 益保护体系化构建的思路。

在信用信息管理、信用评价及其结 果应用、信用奖惩机制运行三个层面, 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所面临的利益冲突表 现、利益协调需求是不一样的。

首先,在信用信息管理层面,信用 主体即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 利益冲突和协调是最为复杂的。信息主 体的安宁期待与信息处理者对更多信息 的期待之间, 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期 待与信息生产、传播、利用的效率追求 之间,本就难以调和。而且,我国数据 和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主要包括《民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 《网络安全法》等,已经构建了一 套非常复杂的协调机制。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专门立法是复制其他法律已经确定 的知情同意规则和异议、更正、删除请 求权规则,还是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进 行限缩或者扩张,这种立法技术上的选 择显然不同于其他层面信用主体权益保 护问题的处理。

其次,在信用评价层面,利益冲突 表现为信用主体免受不当评价的期待与 信用评价主体利用其合法获取的信息的 权利或权力之间的冲突。而且,信用主 体与不同性质信用评价机构之间的期待 冲突也有不同。面对市场化信用评价机 构,信用主体只能在其评价"不当"的 情形下,才能基于《民法典》第1029 条的规定提出"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 措施"的请求,或者在评价行为损害其 名誉权的情形下主张侵权责任。而针对 公权力机构的评价行为,现行法律几乎 没有提供相应的问责或救济途径,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专门立法如何应对,显然 应该有特别的考量。

最后,在信用奖惩层面,市场主体 如何利用信用信息、信用评价结果信息 对待它的交易相对方,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经营自主权的问题,除非涉及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而公权力机构针对信用主 体采取激励、惩戒措施的时候, 当受依 法行政原则的支配。此时, 合法授权、 合理裁量、正当程序的要求决定了作为 行政相对人的信用主体的权利形态和范 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门立法面临着 如何与其他行政管理性、管制性法律相

(作者系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副部 长、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导, 湖南省法学会社会信用体系法治 保障研究会会长、湖南省信用建设促进 会会长)